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丁帆 / 主编

ZHONG GUO XI BU
XIAN DAI WEN XUE 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主 编：丁 帆

副主编：马永强 管卫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十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丁帆主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0

ISBN 7-02-004807-2

I. 中… II. 丁…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西北地区②现代文学-文学史-西南地区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449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Zhong Guo Xi Bu Xian Dai Wen Xue Shi

丁 帆 主编

马永强 管卫中 副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14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30.75 插页 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807-2/I·3700

定价 45.00 元

序 言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足有几百种之多,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隐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撰写宗旨就凸显出来了: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既要成为我们的研究视角,又要成为我们观照一切西部文学的价值理念。于是,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掩埋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我们这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主导思想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鉴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在编撰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史料和资料的搜集。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发出大量信函向个人征集资料时,一捆捆书籍和雪片般的信札如期而

至。新疆青年作家陈漠的来信道出了许多西部作家的心声：“我虽是一个文学新手，但却有着极其虔诚而积极的期待。关于中国西部文学，我从来没有消极过。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西部作家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保持一种健康而平和的心态。我们应当站在人类应有的精神高度从事我们的生活和写作，我们应当把生命一般宝贵的写作生活建造得更加朴素和动人……我心中的西部文学一直在远处金光闪烁着、在远处等我，在远处发出醉人的咆哮。我是怎样期待这一切呀！我等待着那条通往来日的秘密通道！”甘肃作家柏原在信中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是主流话语对放逐已久的西部文化的深切关注，这一写作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在当下的意义……”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许多作家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如此尽心尽责并表达了深切的期盼，他们对西部文学发展的那份诚意和热望使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研究工作有半点马虎。

如何确立撰写的总体思路和方法当然也是成书的关键。首先，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和时段上下限是个难点。在空间区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成为我们划分西部边界的内在标准。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是以游牧文明为背景、为主体的文明范畴（另两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文明范畴是中部农耕文明、沿海都市文明）；在时段划分上，我们本着西部文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参照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不惟政治标准划分切割的理念，对西部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尽量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其次，作为文学史观照的主体对象的作家作品，我们既要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人文理性的价值观去概括其总体特征；同时也要以微观细致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去进行工具性的梳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成为我们内在的撰写视角。在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这部文学史的内在的审美逻辑线索和文化精神线索的贯穿。因此，确立了西部文学“三画”（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来剖析文本。惟此，我们才将获得对西部文学的最准确的文学本质的美学把握。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孕育过程。余光中有一首《民歌》诗这样写道：“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西部口传史诗的神奇、边塞诗的雄浑与瑰丽、西部的浩瀚及风土人情的醇厚、殊异，常常令人向往、迷恋，而能借以慰藉的是长期以来我在乡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研究、体悟中，那些充满地域风情的文本和文化景观给予我的审美满足。但这显然和深入西部文化的内核还是有差距的。90年代后期开

始,全球化境遇下的地域文化差异日益凸现,我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境遇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产生了构建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在多次学术交流中,我的博士生马永强和老朋友管卫中对这一设想的赞同与呼应,使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架构呼之欲出。于是,经过反复的考量,我决定申报“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没有想到竟顺利地通过了立项。此后,由于博士后贺昌盛和新一届博士生李兴阳、贾艳艳等人的加入,更壮大了此项目的科研力量。2000年,我和马永强、管卫中拟订了写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纲,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形成了详细的提纲。嗣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又几经局部修改、变动和调整。

写作的具体分工是:

绪论:丁帆、贺昌盛、马永强撰写;

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马永强撰写;

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三、四节,第六章第四、五节,第九章:管卫中撰写;

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贾艳艳撰写;

第四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二、三节:李兴阳撰写;

第七章第一节:刘昕华撰写;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七章第五节:胡颖、王登勃撰写。

最后统稿由丁帆、马永强、贺昌盛完成。李兴阳和贾艳艳也在统稿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字修改工作。

我们最要感谢的是那些为本书撰写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的西部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们,没有他们的奉献,此书的写作肯定会受到阻遏。再者,就是要感谢南京大学当初负责文科工作的校长洪银兴先生给予的支持。没有上述热心者们的无私的帮助,此书的问世都是很困难的,在此我们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最后还需说明的是,《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

丁 帆

2004年4月2日于紫金山下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独特的文明形态与西部现代文学的视阈	1
第一节 西部的边界与独特的文明形态	1
第二节 西部现代文学的历史演进	8
第三节 西部现代文学的美学风格	18
第一章 西部文化底色与西部现代文学的萌动(1900——1949)	31
第一节 文化底色与西部文学传统的复苏	31
第二节 域外探险者笔下的西部镜像	39
第三节 如火如荼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48
第四节 汇入时代主潮的文化自觉	61
第二章 人的觉醒与西部现代文学的新时代(1949——1979)	80
第一节 西进热潮中的“战歌”与“牧歌”	82
第二节 人的觉醒与多民族的混声合唱	99
第三节 西部现代戏剧的繁荣及民族特色	114
第三章 西部现代文学的繁荣期(上)(1979——1992)	120
第一节 “流放者”的沉吟:反思小说	121
第二节 边地“大风歌”:崛起的诗群	129
第三节 “回忆未来”: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	147
第四节 “盲流”的哀歌:寻找家园的故事	166

第四章 西部现代文学的繁荣期(中)(1979——1992)	171
第一节 垦边悲歌:吟叹不尽的边地人生	171
第二节 雪山冰雕:边地军旅小说	181
第三节 人性悲吟:西部乡土小说	199
第四节 生命之舞:西部戏剧的辉煌与困境	223
第五章 西部现代文学的繁荣期(下)(1979——1992)	230
第一节 旷野独语:西部散文	230
第二节 生命极境:西部纪实报告	253
第三节 长河落日:西部历史小说	268
第四节 诗性歌谣:西部儿童文学	277
第六章 母族的咏叹:西部少数民族文学(1979——2003)	281
第一节 雪域史诗:藏族文学	282
第二节 草原长调:蒙古族文学	295
第三节 天山牧歌: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文学	304
第四节 母族精魂:回族文学	312
第五节 芳草青青:其他少数民族文学	316
第七章 西部现代文学的蓬勃景观(1992——2003)	318
第一节 高地情怀:90年代的诗歌	319
第二节 生灵歌者:成长中的新小说群	345
第三节 大漠孤烟:散文的新时代	383
第四节 走向圣殿:未完成的报告	402
第五节 边塞光影:西部影视文学	409
第八章 西部口传文学的现代传播	415
第一节 史诗之王:《格萨尔》	418
第二节 没有句号的史诗:《江格尔》	433
第三节 悲剧史诗:《玛纳斯》	445
第四节 天籁之音:西部的歌与诗	454

第九章 独具特色的西部现代文学评论	466
第一节 《当代文艺思潮》现象与西部文学	466
第二节 西部评论家的现代文学批评	472
主要参考书目	478

绪论 独特的文明形态与西部现代文学的视阈

西部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不仅秉承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悠久的文学历史传统,而且始终呼应并参与着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的建构。如果从“地域人种”和文明形态的视角来看,西部现代文学又存在着迥然区别于中部和东部文学的极其特殊的一面,一直伴随着“抵进本土”、“发现本土”的内在追求和艺术超越,从而凸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景观和风貌。那么,如何深入地开掘这一文学形态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的特定文化蕴涵,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从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入手,来展示这一地理文化版图上产生的特殊文学形态,从而使得中国西部地区自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种种文学事件,以及中国西部文学丰富多彩的美学形态,得以准确而有力地呈现。

这里拟就“文化西部”概念的确立、中国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西部现代文学的演进历程及其整体的美学风格等方面的问题作出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 西部的边界与独特的文明形态

文化从本质上来说特定文明形态的外化,它不仅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且也与它相对应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那么,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究竟包含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呢?它又是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西部现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所讨论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

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主要是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的游牧文明覆盖圈。这是一个“文化西部”的概念。与此对应的另两个文明参照模式是: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的现代都市文明,以及处在都市文明与游牧文明板块之间的广阔的中部农耕文明。以上便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基本文明形态之基础。

一、“文化西部”的独特内涵

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呈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状,西部涵盖了中国地形中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中的大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部、北部以及辽阔的新疆腹地),不仅多高山,而且大部分地区处在草原、干旱和半干旱、荒漠和半荒漠的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地”文化,其环境与气候的酷烈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高、寒、旱。因此,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以游牧为主体并兼有农耕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一地域的农耕文化从其大的背景来说依然是游牧文明的底色,而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存在着鲜明的文化落差与反差,因此,我们还是将其在总体上划归于以游牧生产模式为主的文明范畴。

相比于农耕文明而言,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具有前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性。但由于其自身无法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自给自足,所以,必须在与外界,特别是与农耕民族的产品交换中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从而形成了严重的经济依赖关系。在此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他们对农耕文明的茶叶、食盐、铁器、布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依赖和需求,大部分是以快马奔袭和抢掠的方式完成的。宋代以降,在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出现过的“互市”和“榷场”,曾经使游牧与农耕这两种不同文明的生存方式间的互需关系得以合法化。这种经济依赖关系不仅成为游牧和农耕区的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成为制约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还具有迁徙属性。“蒙藏多以游牧为生活,每当秋末冬初,便收拾帐篷,赶着牛羊,向外移动,逐水草而居”^①。“游牧人不迁徙难以生存,农耕人却必须依附于土地。开田辟地,建设水利,需时费工,垦殖有成,则世代有赖,劳作以时,年年均有收成,所以往往足不出乡里,行限于方圆,安土

① 谷苞:《甘肃藏民的分支派及其分布》,《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编,1987年版,第75页。

重迁。游牧人迁徙则行踪万里。两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乃至文化心态上是大不相同的”^①。这说明,游牧经济的迁徙属性使游牧文明具有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不但使游牧文明除却了农耕文明那种保守心态和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体系,而且培育了游牧民族宽广的胸怀与开阔的视野,也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游牧文明的“开放性”和“迁徙性”,影响并决定了西部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崇山峻岭、戈壁流沙培养了游牧民族的坚韧意志与不断开拓的力量;多变的气候和山崩雪灾教会了他们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生存经验。他们之所以常常载歌载舞,以豪迈纵情的歌唱来赞美他们的栖居之地,这不只是因为西部自身有着怡人的景观,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的自然特性与游牧文明的“开放性”和“迁徙性”一道催生了西部民族独有的礼俗、婚姻形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结构,以及与农耕文化的那种土地意识及守成眼光全然迥异的生存观与价值观。这就是西部这一独特文明形态的主要内涵。

二、“文化西部”的互融形态

中国西部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这里不光是氏、羌、吐蕃、匈奴、回鹘、突厥、乌孙、党项、鲜卑等古老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逐渐融合并形成了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撒拉、裕固等数十种民族。西部由此成为域内多民族角逐和融合的历史舞台,也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交融、碰撞的枢纽,从而形成了西部独特的文化互融形态和风貌。

西部文化互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民族迁徙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也有邻近民族相互间在文化上的吸收;有对外族文化同步形态的吸纳,也有不同发展阶段文化间的相互融会。从上古开始,西部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据传华夏始祖之一的黄帝部落就来自于西部,周人与秦人(之后向东迁移至洛阳和咸阳一带)的祖先不但起源于西部,而且早已开始同西部高原的羌人等联姻和往来。生活在广袤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走马灯似的在西部的历史长河中踱过,有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融合、分化为别的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中心区互有冲撞和变化。“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而游牧文化又曾多次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发生碰撞,并在反复冲突中实现融

^①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合。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① 中原政权也常常出于扩大疆域和统一治理的需要,对西部民族发动了不同规模的战争。随着不同王朝向西部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已逐步形成了混居,加上部分民族的东迁,中国西部的民族大融合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同民族在同汉族的长期往来中,其生活方式也有逐步汉化的趋向。例如,甘肃酒泉、民乐一带的“汉番”就是“汉族与番民在体质上与文化上糅和的结果”^②。同时,在这一民族杂居区的民族交融也必然是双向进行的,“汉族在变,少数民族也在变”^③。正如司空图的《河湟有感》所写的汉人藏化的情景:“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所以,余斌认为:从唐以降到现在,民族融合一直在“花儿”的原产地——甘宁青交汇的地区进行,“有的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如吐谷浑),或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如羌族);同时经过融合产生了新的民族(如东乡族),迁来了外地的民族(如蒙古族)”^④。这样“双向”进行的文化交融,使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国西部多元文化的基本面貌。

不仅如此,西部各民族还有着与域外各民族交流的悠久历史,“古代丝绸之路”在这里一直是连接中亚、西亚、希腊和罗马的重要枢纽,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最为有利的结果就是,异质的文化进一步走向了交融。例如,古鄯善国的健陀罗艺术就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库车)各式雕塑、绘画、建筑就深受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域外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的既有文化在这里都有了相互比照与交汇的开阔空间。

这一民族交融的历史和现状,既是特定经济形态下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季羨林阐发了这样的看法:古丝绸之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⑤,形成了多元文化混合的特色。因此,在这一地域形成的陇右文化、敦煌文化、西域文化、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等,必然带着浓郁的游牧、宗教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色彩,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外

① 冯天瑜 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② 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玖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5页。

③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④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第41页。

⑤ 季羨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现,而是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与深厚的文化记忆。

三、“文化西部”的宗教文化底蕴

西部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形成与西部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密切相关。就宗教文化的流播而言,穿越甘肃长廊和新疆腹地的古丝绸之路,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中华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碰撞和汇合的锋面。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中扎根,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体系及宗教文化圈,之后,它又向东北越过甘肃长廊直达内蒙古草原,成为横贯青藏、内蒙两大高原的宗教链;从中亚传入并在整个新疆盛行的伊斯兰教,沿着甘肃长廊向东南方向流播,在黄土高原的西南部、北部,形成了继新疆伊斯兰文化圈之后又一个浓郁的伊斯兰文化圈,而且,这一流播也辐射到了中原农耕文化区域;与此相对应,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农耕区域的汉文化,亦沿着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夹缝,通过长条形的甘肃走廊向西南、西北传播:一路翻过日月山和“唐番古道”与雪域文化相汇,另一路直插新疆腹地,与伊斯兰文化交融。从以上宗教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传播趋势来看,古丝绸之路作为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最西端和末梢,不仅连结了西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而且为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广袤的发展空间。

不同宗教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互融现象,“祁连山北麓的马蹄寺、文殊寺都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汇点。先有汉僧洞窟,后有藏僧寺院,汉藏僧人间有着长期友好合作与交流。如马蹄寺石窟先为前凉时期郭王禹开窟讲学所造,后成为汉传佛教圣地。马蹄藏族形成后,又转依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3、4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道教内容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①。

同时,西部的气候、地理条件,也决定了西部民族对宗教的选择,这成为影响

^① 朱越利:《藏传佛教和道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西部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中国西部疆域的广袤与自然条件的酷烈,带给人的精神抗争和守候是艰难而无望的,所以,人们选择宗教作为灵魂安放的居所,以此来打发心中的念想和孤寂。因此,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风行,不但成为草原民族的信仰,而且已经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无意识心理层面;伊斯兰教潜入苍凉的新疆腹地和干涸的黄土高原,被沉默的西部人紧紧拥抱,它带给人们的是隐忍的性格和坚守的品格,是重义、守贫、克己、安命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灵魂自由的虔诚追求。

四、“文化西部”的文学艺术遗产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无疑显示着该民族文化的最为集中的内容。中国西部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形,既是特定自然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演进的过程。生活在西部的不同民族都有着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色彩鲜明而又独具风格的文化,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东方和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贡献。

早在汉代,西域地区的焉耆、龟兹、于阗等地的民族就已经有了拼音文字,维吾尔族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11世纪写成的长篇巨著《福乐智慧》,引起世界瞩目。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被维吾尔人称之为社会生活大百科全书的《突厥语大词典》,以其丰厚的学术价值而闻名于世。享誉中外的敦煌石窟及克孜尔千佛洞等,是汉民族与鲜卑族、吐蕃族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它充分显示着中国西部古代各民族艺术家们卓越智慧和才能。北朝民歌《敕勒歌》以其耀眼的光辉盛传不衰。藏族文学在10世纪左右就有了高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藏文作品,如《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仓央嘉措诗歌》等,不仅在藏民族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蒙古文化早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之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后有蒙古族第一部文学巨著《蒙古秘史》(13世纪)、历史文学巨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17世纪)等,它们反映了蒙古民族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在不同的朝代,西部也都有不同民族的作家在母语之外采用汉文写作,唐代著名的诗人坎曼尔就是回纥人、维吾尔族的贯云石是著名的散曲家、回族的萨都刺是杰出的诗人和词人等。

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尚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虽然有文字却不那么完整,使用也不普遍,他们的文学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这使

他们的史诗等口传文学样式相当丰富和发达,尤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最为突出。在所有西部民族史诗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史诗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民族个性以及浩繁宏大的规模,显示了中华民族英雄史诗的高度艺术成就。

中国西部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民间故事。众多民间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智人物故事,而以纳斯尔丁·阿凡提和阿勒达尔库萨等人物的故事最能体现西部民间传奇的那种幽默诙谐的风格。这类清新活泼、妙趣横生的作品多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展开叙述,诙谐与嘲弄并置,显示着与中原智者截然不同的民间生存智慧。另外,《马五哥与尕豆妹》、《米拉尕黑》这类优美的西部民间叙事诗与抒情诗也很丰富,它们一般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头传唱而层累式地形成的,所以其中常常蕴涵着许多为正统文学所难以容纳的因素,从而保留了那些无法被意识形态所规约的原生态的艺术因子。如《马五哥与尕豆妹》中并不对杀死自己小丈夫的尕豆妹作出道德谴责;又如《嘎达梅林》描述牡丹杀女焚屋、毁家起义的情节,也同样把人物放置于超越道德伦理范围外的激烈情感与特定境遇之中,与中原民族文学中的农耕文化道德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西部堪称是“歌唱的世界”,“唱歌”几乎是西部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生产劳动、休息娱乐、往来社交都伴随着歌唱,歌声总是渗透在放牧、婚恋、思乡甚至与动物的情感交流之中。中国西部的歌手既是民族传奇的演唱者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更是英雄史诗的保存者甚至创作者。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朱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和毛依罕、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维吾尔族歌手尼沙汗等。口头歌唱的文本常常涵盖了广泛的知识 and 人类经验,西部民族的说唱艺人和歌手们,不只是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更保存了各民族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那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如:藏族的鲁体民歌及谐体民歌,蒙古族的“好来宝”,回、东乡、撒拉等民族的“花儿”等。概言之,无论是在格局、语言、韵味还是状物、抒情、言志手法等方面,西部口传文学都有着迥异于农耕文化的特色,他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部多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形成,而且,有不少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既定范型。

除此之外,作为西部多民族文化形态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西部汉语创作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本土的李梦阳、胡纘宗、吴镇、秦维岳、吴可读等

人的创作,以及李广利、霍去病、王维、骆宾王、岑参、王昌龄、杜甫、高适、王建、范仲淹、林则徐、邓廷桢等历代边塞诗人的作品,当然更包括横空出世的敦煌文学等。

从总体上说,正是中国西部这种特定的自然条件、生存境遇与文化互融形态,才造就了西部民族所特有的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西部民族所创造的独特、自由而又粗犷、豪迈的西部文学,无论是英雄史诗、民间传说,还是神话故事或抒情歌谣,渗透于其中的总是那种既苍凉悲壮而又豁达明朗的美学情致。也正是这种独有的美学情致才使得西部文化氛围与中原文明的“和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韵致,以及现代都市文化的繁忙快捷和利益机心区别开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曾长久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日益加剧,西部文化同样在不断寻求着自身现代化的有利途径。与文化交流相伴而生的,就是那种既区别于传统的西部文化,又与中原和东部的农耕文化及现代都市文化相迥异的整体的现代西部文化品格。所以,确立“文化西部”的基本范畴,其意义就在于能进一步总结和发掘这一独特文化形态的潜在资源,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能够更为全面而充分地融入到整体的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中去。如果说自近代以来的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不但在显示着中原农耕文化的陈旧与衰落,而且也日益显示着现代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道德与信仰危机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身处“边缘”的独特的西部文化资源就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突围”过程中难得的财富。

第二节 西部现代文学的历史演进

既然西部的边界已经划定,那么,什么才算是西部文学呢?我们认为,只要文本的旨意是指向西部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就都属于西部文学论域的范畴。它既包括西部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民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也包括历朝历代的文人创作。就文人创作而言,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土著作家,即生活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的创作;第二类是流寓作家,因为除西藏以外的西部,一直是将士戍边(包括后来的军垦)、垦荒移民(包括后来的支边者、知识青年等)、罪犯流放、官员贬谪的主要